

风险感知对高职学生电信诈骗防范行为的影响研究

陈曦, 徐游, 季勇军, 阮文希, 张竞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台州

摘要: 电信诈骗防控是当前高职院校校园安全建设的重点议题。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电信诈骗风险感知对电信诈骗防范行为的影响路径, 发现单纯的风险感知对防范行为的直接驱动作用并不显著, 且盲目乐观偏差的存在进一步弱化了学生的防范意识。研究证实反诈知识储备在二者之间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拓展了对电信诈骗防范过程中个体决策机制的理解, 并为高校制定精准的防诈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 风险感知; 反诈知识水平; 盲目乐观偏差; 电信诈骗防范行为

The Impact of Risk Perception on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Prevention Behavior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Xi Chen, You Xu, Yongjun Ji, Wenxi Ruan, Jing Zhang,

Taizhou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zhou, Zhejiang

Abstract: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prevention constitutes a critical focus in campus safety initiatives at higher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pathways of risk perception on prevention behavior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ere risk perception does not significantly drive prevention behaviors directly, and the presence of blind optimism bias further weakens students' awareness of prevention. However, the research confirms that anti-fraud knowledge reserves play a cruc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This discovery expa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in telecom fraud preven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universities to formulate precise anti-frau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Risk Perception; Anti-fraud Knowledge Level; Blind Optimism Bias;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Prevention Behavior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所处的安全环境日趋复杂,面临的风险因素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校园安全治理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与身心健康,更深刻影响着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办学声誉,乃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鉴于此,构建科学、完善且高效的高校安全教育与管理体系,已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与实践任务。

近年来,高校电信诈骗事件频发,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社会效应。既往研究指出,由于传统安全教育模式往往与学生的风险感知存在错位,导致其在电信诈骗防范方面的实效性有限[1]。亦有学者提出,青年群体的受骗结果通常是情境因素与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2]。为探究具体成因,部分研究通过编制《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问卷》,识别出网络使用习惯、信息加工方式及自我控制能力等关键影响因子[3]。然而,现有文献尚未深入剖析个体因素影响电信诈骗防范行为的内在机制,这为后续研究留下了探索空间。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电信诈骗风险感知与电信诈骗防范行为之间的关联,并创新性地引入“反诈知识储备”与“盲目乐观偏差”作为关键变量,旨在通过厘清各变量间的作用机制,为制定诈骗防控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相关理论构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阐述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管理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电信诈骗风险感知与电信诈骗防范行为

电信诈骗防范行为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风险决策过程。根据保护动机理论(PMT),个体对威胁的认知评估是激发保护意愿的关键前因。具体而言,风险感知主要包含感知严重性与感知易感性两个核心维度。当个体感知到的风险威胁程

度越高,其采取保护性行为的动机往往越强,这一逻辑在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相关研究中已得到充分的实证支持[4]。基于此,本文认为高水平的风险感知能有效驱动高职学生采取防范措施。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 电信诈骗风险感知对电信诈骗防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电信诈骗风险感知、反诈知识储备与电信诈骗防范行为

依据期望-价值理论(Expectancy-Value Theory),任务价值是驱动个体学习动机的核心要素之一,即任务对实现个体未来目标的效用程度[5]。在电信诈骗情境下,当个体感知到的风险威胁愈强烈,其规避风险的意愿便愈强,进而赋予反诈知识学习更高的预期效用。这种心理机制会促使个体主动获取信息,从而形成更丰富的反诈知识储备。进一步地,充足的知识储备能为个体识别诈骗手段、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必要的认知基础与技能支撑,从而促进防范行为的产生。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 电信诈骗风险感知对反诈知识储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 反诈知识储备对电信诈骗防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 盲目乐观偏差与电信诈骗防范行为

受认知偏差的影响,个体的主观风险评估往往偏离客观实际。Weinstein(1980)的研究指出,大多数个体倾向于持有盲目乐观偏差,即认为自己比“一般人”遭遇负面事件的可能性更低[6]。在电信诈骗防范中,这种非理性的乐观倾向会显著降低个体对自身受骗易感性的评估,使其错误地认为自己具备免疫能力,从而削弱应对风险的警觉性,抑制防范行为的产生,最终增加受骗的风险。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 盲目乐观偏差对电信诈骗防范行为具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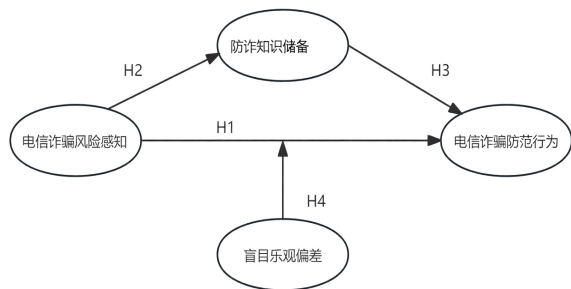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与关系假设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浙江省台州市某高职院校在读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数据收集采用非概率抽样策略，具体结合了方便抽样与滚雪球抽样法。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70份，回收后经严格筛选，剔除作答时间过短、呈现规律性作答等无效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55份，有效回收率为94.4%。

3.1 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调查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旨在收集受访者的口统计学特征；第二部分为核心变量的测量。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本研究中的核心量表均参考国内外成熟量表进行改编，并根据电信诈骗的具体情境进行了本土化修正。所有题项均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数据处理与分析阶段，首先运用Stata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随后采用Smart-PL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检验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各变量的具体测量题项如下（见表1）：

3.2 数据特征与信效度检验

在最终纳入分析的255份有效样本中，女性占比为88.73%。尽管样本性别比例呈现不均衡状态，但考虑到该校在校生总体女性比例约为86%，该样本结构与总体特征基本吻合，说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受骗经历方面，8.73%的受访者表示曾遭遇过电信诈骗，18.25%的受访者报告其家人或亲友曾有过受骗经历。考虑到本研究样本

量相对有限（N=255），且并未假设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选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实证分析。该方法在处理小样本及非正态数据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如图1所示，研究模型涵盖电信诈骗风险感知、反诈知识储备、盲目乐观偏差及电信诈骗防范行为四个潜变量。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属性。具体而言，所有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及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0.7的临界值，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均大于0.5，证实了量表具备良好的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表1. 核心变量测量量表

电信诈骗严重性感知：	
如果我遭遇电信诈骗，将会给我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如果被骗，我会感到极度的沮丧、焦虑或羞耻。	
遭遇电信诈骗会严重干扰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	
反诈知识储备：	
我能够准确地说明什么是电信诈骗。	
我对骗子的电信诈骗话术非常了解。	
我知道如果不幸被骗，应该采取什么紧急措施。	
电信诈骗防范行为：	
我会点开陌生人发送的链接。	
我会通过非官方渠道下载软件并安装。	
我会在社交软件上通过陌生人的好友申请。	
我会在社交软件上发布与个人信息相关的内容动态。	
盲目乐观偏差：	
只有那些贪婪或愚蠢的人才会被电信诈骗骗到，而我不属于那一类。	
只要我不想被骗，骗子就绝对骗不到我。	
我觉得自己的运气通常比别人好，倒霉事不会发生在我头上。	

注：电信诈骗严重性感知：主要测量个体对遭受诈骗后果的严重程度预估，包括经济损失、心理创伤（如沮丧、焦虑、羞耻感）以及对正常生活秩序的干扰。反诈知识储备：主要测量个体对电信诈骗概念、常见话术及应急处置措施的认知掌握程度。电信诈骗防范行为：主要测量个体在网络环境中的行为倾向。该维度题目为反向题，即“同意”程度越高，代表防范行为越弱（或风险行为越高），分析时已进行反向计分处理。盲目乐观偏差：主要测量个体对自身免受诈骗的非理性自信，包括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幸运、更聪明或具备天然免疫力等认知偏差。

表2. 聚合效度分析

变量	Cronbach's alpha	组合信度	AVE
反诈知识储备	0.720	0.830	0.621
电信诈骗风险感知	0.726	0.845	0.646
盲目乐观偏差	0.803	0.878	0.707

电信诈骗防范行为	0.864	0.907	0.709
----------	-------	-------	-------

根据表3的数据分析结果，所有观测变量在对应构念上的载荷值均明显大于其在其他构念上的交叉载荷值。依据Chin（1998）提出的判定标准，该结果证实了各潜变量之间具有充分的区别效度。

表3. 区别效度分析

	电信诈骗 防范行为	反诈知 识储备	盲目乐 观偏差	电信诈骗 风险感知
BEH1	0.833	0.037	0.170	0.054
BEH2	0.802	0.054	0.244	-0.023
BEH3	0.882	0.053	0.275	0.072
BEH4	0.849	0.036	0.269	0.070
KNW1	0.088	0.726	0.298	0.162
KNW2	0.006	0.773	0.306	0.165
KNW3	0.130	0.859	0.115	0.265
POS1	0.179	0.254	0.800	0.072
POS2	0.204	0.307	0.852	0.015
POS3	0.314	0.151	0.868	0.017
SER1	0.005	0.198	0.043	0.761
SER2	0.117	0.218	0.090	0.820
SER3	0.005	0.221	0.027	0.827

4 数据分析与模型测试

基于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对模型路径系数的显著性进行进一步检验。表3列示了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

表4. 拔靴法下的路径分析

	路径假设	相关系数
H1	电信诈骗风险感知 -> 电信诈骗防范行为	0.066
H2	电信诈骗风险感知 -> 反诈知识储备	0.265***
H3	反诈知识储备 -> 电信诈骗防范行为	0.166*
H4	盲目乐观偏差 x 电信诈骗风险感知 -> 电信诈骗防范行为	-0.186**

备注：***表示在0.00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下显著。

Sobel检验结果显示，Z值为3.860，且在0.001水平上显著（p<0.001）。这一结果证实，反诈知识储备在电信诈骗风险感知与电信诈骗防范行为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电信诈骗风

险感知对防范行为虽然具有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并不显著。第二，高职学生对电信诈骗风险的感知越强烈，储备反诈知识储备越完备；且实证表明，反诈知识储备对电信诈骗防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第三，盲目乐观偏差对电信诈骗防范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削弱作用。具体而言，受盲目乐观偏差影响，高职学生倾向于表现出更激进的行为模式，从而忽视潜在的诈骗风险。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研究聚焦于电信反诈过程中的个体决策机制，为观察和理解电信反诈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是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其次，尽管风险感知是行为研究的常规切入点，但本研究创新性地引入了“盲目乐观偏差”这一关键个体特质变量，从而拓展了保护动机理论在电信诈骗防范领域的应用场景与解释力。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为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电信诈骗挑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构建完备的反诈教育体系。应当畅通反诈知识的学习渠道，一方面将碎片化的反诈知识嵌入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场景中，另一方面可引入游戏化学习等手段，提升学生掌握反诈技能的实效性与趣味性。二是，强化风险认知教育，消除侥幸心理。应通过客观数据揭示电信反诈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并结合真实发生的案例进行警示教育，使学生明确感知到风险。三是，建立社会支持与应急响应机制。引导学生认识到电信反诈并非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行动；鼓励学生在产生疑虑时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同时，应建立完善的事后干预机制，教育学生在遭遇诈骗或产生损失时，应采取理性措施及时止损，防止危害后果进一步扩大。

致谢

本文得到了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嘉木护航”名班主任工作室项目的支持。

参考文献

[1]许倩.强教育与弱感知：高校安全教育中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大学生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电信诈骗的多案例

- 研究[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02:32-43.
- [2]赵雷, 陈红敏. 电信诈骗中青年受骗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研究[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2, 41.03: 102-112.
- [3]孙晨博, et al. 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问卷的编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4, 38.10: 894-900.
- [4]Bundorf, M. Kate, et al. "Risk perceptions and private protective behaviors: Evidence from COVID-19 pandemic."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7.3 (2025): 728-740.
- [5]Eccles, Jacquelynne S., and Allan Wigfield. "Motivational beliefs, values, and goal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1 (2002): 109-132.
- [6]Weinstein, Neil D.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future life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5 (1980): 806.

